



从底层的士到现代知识分子

——论传统小说家的身分变化及其小说史意义

汤克勤

摘要:传统小说家在汉代就被确立为士,但属于不入流的底层的士。他们的作品关注的是“治身理家”的小问题,被视为“小道”、“末学”,其社会身分与其作品的关注内容是一致的。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的地位猛然飚升,但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士,而迅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其小说作品关注的重心,也由“修身理家”的小问题变为“救国救种”的大事。传统小说家的身分与身分变化,从某一侧面显示了小说家的整体命运和特性,其关注重心的变化,对于其小说创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小说史意义亦由此可见。

关键词:传统小说家;士;现代知识分子;身分;小说史

中国小说家在汉代就被确立为士,但属于不入流的底层的士,他们的小说作品被视为“小道”、“末学”。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的地位猛然飙升,传统的士开始迅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本文尝试探讨传统小说家的身分、身分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创作特征,并据以考察其小说史意义。

一、传统小说家作为士的身分的确立

汉代首先出现“小说家”一词。受先秦诸子和史传影响而产生的小说,到汉代渐入佳境,被视为诸子“十家”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①。

班固首创“稗官”一词,但在《汉书·百官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中都无法找到此职名,究竟这是什么官职,于何时出现,至今难以确知。《汉书·艺文志》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唐颜师古注云:“稗音禾稗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许慎《说文解字》将“稗”字解释为“禾别也,从禾卑声”;晋杜预在注《左传》时将“稗”解释为“草之似谷者”。综上所述,“稗”的原意应该指稗草,稗草似禾谷,却果实小,价值远不如禾谷,因此,“稗”可引申出“卑微”、“低下”之意,“稗官”于是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小官”。“稗官”指哪一种小官?学界对此有过争论,其中余嘉锡和袁行霈的观点互不相同,影响较大。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指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并说其士的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

^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

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①。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一文对此表示怀疑:“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国语·楚语》、《吕氏春秋·达郁篇》、《新书·保傅篇》、《淮南子·主训术》以及贾山《至言》等书,都是传庶人之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稗官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②进而指明,稗官并不是天子之士,而是指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他们的职责是采集民间的街谈巷语,以帮助天子了解风俗民情。

我们认为,余嘉锡说稗官指“天子之士”更接近历史事实。这可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小说得到证明。十五家小说有三家标明作者的官职,它们是《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前二者作者是待诏,后一家作者是侍郎^③。据《汉书》等记载,待诏和侍郎,其身份和职责正好与稗官相吻合。《汉书·袁帝纪》注引应劭语云:“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颜师古注之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张衡《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④薛综注“虞初”曰:“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可见,待诏、侍郎是受皇帝征召,“上书言得失”,“待上所求问”的“天子之士”。袁行霈仅据“《汉志》小说十五家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而判定稗官非天子之士,其论据尚不够充分。

我们进一步辨析“街谈巷语”的含义。鲁迅说:“‘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又说:“《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⑤显然,鲁迅将“街谈巷语”单纯地看作是下层百姓的言论,可是,当他联系《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的实际作考察时,又发现有些小说并非“采自民间”,而是出于“士之所为”,这一点让他感到疑惑。其实,在先秦两汉,“街谈巷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老百姓的言论,也包括士在朝廷之外对朝政得失的议论。如张衡的《西京赋》所写:“若其五县游历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以,我们认为,既然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小说家就可能是“游历辩论之士”。因此,小说家的身份可以确定为士。

但是,张衡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说法,其《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意即:最初的小说家,是方士虞初。有的学者考察班固著录的小说,发现其中与方士、方术相关联的占绝大多数,于是得出了结论:最早的小说家是方士^⑥。这一结论并非没有道理,但不可绝对化。

方士成为小说家,在秦汉时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当时统治者非常迷信神仙方术,致使方士大行其道,《后汉书·方士传》小序云:“汉至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屈焉。”由于“方士一贯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方术卖与帝王家;而自己成为卿相公侯一流的人物”,因此,“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按,原文如此),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凭借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⑦方士成为小说家,就是这种现实环境的产物。

实际上,张衡的说法与班固的说法并不冲突。方士也可以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或“闾里小知者”,有的方士甚至就是“稗官”。虞初是“方士侍郎”;《待诏臣饶心术》的作者饶,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时指出,“齐人也”,“武帝时待诏”,齐国是出产方士的地方,饶作“心术”,可以说他的小说也属于方术书。汉代方士所作小说,内容多与“心术”、“未央术”有关,是后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前驱。只是,为

①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68、267页。

②清思录:袁行霈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③《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注《虞初周说》作者“虞初”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④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15页。

⑥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24页。

⑦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小说与方术》,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1页。

什么后来小说家队伍中方士不多呢？这是因为方士已尽量向儒士靠拢、转化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方士们为争取政治权力相率归到儒生的队伍里去了。所以，后来的小说家越来越多地由儒士组成。

以上所述，是汉代人对中国最早一批小说家的认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小说家的认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家，无论是“稗官”，还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无论是“闾里小知者”，还是方士或方士化的儒士，都应该首先是士。当然，他们在整个士阶层中处于附庸、底层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一家。之所以不入流，是因为他们关注的都是生活中的小问题，而不是国家大政。秦汉以降，小说家有时被归入子部，有时被归入史部，有时甚至被归入杂家，但无论归入哪一家，都被放在附庸的位置上，其原因还是在于，小说家关注的是家长里短，而非军国要务。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其实也正体现在其关注对象方面。其表现手段可以有种种变化，但其关注的生活内容却大体属于“治身理家”的同一范围。从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到传奇小说，再到话本小说，再到章回小说，相互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但在这一方面却相当一致。

二、小说家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

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遭受歧视的现象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维新政治的需要，政治家梁启超登高一呼，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把“新小说”创作和“改良群治”、“新民”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二者看作是因果决定的关系，再加上大量译介的域外小说，涌进了国门，于是，小说的地位被士人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相应地，小说家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其地位明显被抬高，小说家几乎等同于呼风唤雨、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家。晚清小说家不再担心遭受轻视，而是大胆地发表小说作品，敢于公开以小说家自居。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寅半生在1906年《游戏世界》第一期发表的《〈小说闲评〉叙》中感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晚清时代，小说作品犹如水涨潮涌，纷纷出笼，小说家的地位犹如火箭发射，由士之底层一跃而青云直上，升到了士的上层。比较古代小说家，晚清小说家仿佛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天地悬殊之感。当小说家作为士的地位猛然飚升到最高端，也就到了小说家作为士的身份终结时，晚清小说家开始由士转型为知识分子，他们成为近代最活跃的知识人群体之一。

晚清小说家完全不同于古代小说家。在“小说为小道”的传统歧视中，作为士的古代小说家为争取在士中的地位，不懈地创作小说作品，以表现其士的身份和属性——忠君、传承知识和坚守道义；而晚清小说家是在“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的时代气氛中进行小说创作的，大的方面要“改良群治”，“新民”，“开通风气”，小的方面则为一己之私，“为名”，“为利”^①，他们基本上抛弃了忠君观念，而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古代小说家生前大体上默默无闻，不能因小说获得荣耀，反而以做小说家为耻恨，他们没有独立的小说家的身份意识；而晚清小说家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明星式的人物（主要通过阅读他们在报纸、杂志、书局发表、出版的小说作品的方式），他们是近代知识人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小说是其安身立命的工具，他们敢于公开以小说家自居，这显示出其作为小说家的身份意识的觉醒。古代小说家总体上是属于不入流的士，其作品关注“街谈巷语”、“修身理家”的小问题，而被视为“小道”、“末学”，他们在士中的地位颇低，备受歧视与压抑，甚至有被剥夺作为士之资格的危险；而晚清小说家自小说从文学的边缘被推向中心之际，他们在士中的地位猛然飙升，其作品关注的重心也由“修身理家”的小问题变为“救国救种”的大事，当科举制度这一士的制度化的再生机制被清廷废止时，他们从此终结了士的身份，开始向知识分子转型。晚清小说家被时人认为是“其思想有能高出社会水平线以外者”^②。时人曾描述在晚清小说家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①陈景韩：《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载《时报》1905年5月27日。

②天穆生：《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载《月月小说》1908年第2期。

昔之以读小说为废时失事、误人心术者;今则书肆之中,小说之销场,百倍于群书。昔之墨客文人,范围于经传,拘守夫绳尺;而今之所谓小说家者,如天马行空,隐然于文坛上独翘一帜^①。

(以俗语开民智、改良社会)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

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②。

的确如此,晚清小说家与其他近代知识人一样,其知识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像“昔之墨客文人”“拘守”于儒家“经传”,而是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如“文学,小说家所有事也;常识,小说家所当知也。经传之信条,先贤之学说,西来之新知识,又小说家所当知也。甚至愚夫愚妇之心理,世态人情之变幻,又无不当知之也”^③。由于其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清小说家作为士的身份、属性也相应得到了改变,他们向知识分子转型了。

晚清小说家终结其作为士的身份、属性的最鲜明表现是: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新小说”作品。新小说之所以“新”,不仅表现在小说题材、小说思想观念、小说形式方面的前所未有的、前所未闻,而且还体现在小说家具有新的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

晚清出现了很多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类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时事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国民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甚至“航海小说”、“虚无党小说”、“广东民族迁徙绣像小说”……许多陌生而令人兴奋的题材,如政治立宪、反清反帝、教育改革、女子学堂、域外奇闻、科学幻想、婚姻自主、侦探推理、留学生生活等,也纷至沓来。新的小说类型充斥着崭新的思想内容。“社会小说”、“国民小说”、“教育小说”,无疑传达出一种全新的公民意识和知识分子意识;“政治小说”、“理想小说”、“时事小说”,成为小说家干预现实、表达理想的形式,小说关注的重心变为“救国救种”的大事;“侦探小说”展示的是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逻辑推理及科学断案过程,也不妨认为是无意中对中国进行了最初的现代法制与科学观念的启蒙;“科学小说”表现了近代知识人对迷信的批判和对科学的推崇,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思潮在此可见端倪^④。

新小说的创作者——晚清小说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小说家的独立自主精神,他们纷纷以开通民智、革新社会为使命,对自己为名利的小说创作目的也毫不掩饰。海天独啸子在1904年发表“闺秀救国小说”《女娲石》,其《凡例》云:“近来改革之初,我国志士,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故近日所出小说颇多,皆傅以伟大国民之新思想。”1907年,《中外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林〉之趣旨》,说:“处二十世纪时代,文野过渡,其足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诚莫小说若。”大多数晚清小说家顺应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时代浪潮,以“开通风气”为己任。这是晚清小说家的一种神圣使命,也是其小说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梁启超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留学生作为“新中国”的主人翁,通过改良立宪甚至革命手段,对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作出了大胆的构想。李伯元谴责了清朝官场的各种丑恶、腐败,使之“现形”,希望将小说《官场现形记》作成一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⑤。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缘》和吴趼人的《瞎骗奇闻》、《糊涂世界》等小说向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揭示出因执迷不悟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来震惊误入迷途的人们。这些内容都是古代小说所不能表现的。这些内容显示出小说家已转型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精神和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属性。

除了“开通风气”之外,晚清小说家创作小说的目的还有“为名”、“为利”两种,正如时人所观察的:“窃谓今之投笔于小说界者,亦有三解在:其一固欲借此以开通风气也,其一则为名者也,其一则为利者也。”^⑥传统小说家似乎从未有“为名”、“为利”的创作目的(个别以出版商为职业的小说家如明代熊大木等除外),而晚清小说家则公开表白这方面的思想,例如吴趼人曾诙谐地说:“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

①世(黄小配):《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载《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4期。

②楚卿(狄楚青):《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载《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③铁樵:《〈小说家言〉编辑后记》,载《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6号。

④杨联芬:《“新”之所以然——晚清新小说论》,载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李宝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2页。

⑥陈景韩:《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载《时报》1905年5月27日。

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乃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或笑曰：‘不图先生吃饭，乃是咬文嚼字。’”^①清末，世俗化大潮滚滚而至，科举废除又使士人断绝了晋身之阶和生存之路，于是，“著书都为稻粱谋”成了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晚清小说家“为名”、“为利”的创作目的也应时而兴了。大体上说，晚清小说家几乎都同时具有以上的三种创作目的，尤其是晚清职业小说家，其“为名”“为利”的创作目的似乎更占上风。这一事实其实说明了一个新的现象：晚清小说家已不同于羞于言利、不问庖厨的传统之士，追名逐利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件羞耻之事，而是一种摆脱君王贵族控制、命运独立自主的进步之表现。不管是“开通风气”，还是“为名”、“为利”，晚清小说家具有这些创作目的，显示出其自我精神的初步觉醒，他们已转型为知识分子了。

稍加展开来说，以梁启超、刘鹗和曾朴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敢于叛逆正统士大夫轻视小说的传统，鼓吹“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中国小说家“与泰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小说林社总发行启》），并亲身投入小说创作，以其大胆的行为和创作实绩，真正抬升了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他们借小说创作不但实现了其作为士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而且显示出：他们已不再是以忠君为最大前提的传统士大夫，而是逐渐转型为近代新型的知识人，具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意识和国民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品格。

以李伯元、吴趼人、包天笑和黄小配为代表的以报人身分为主的晚清职业、半职业小说家，人数最多，良莠不齐，他们体现出普通士人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风貌和特征。他们依托于全国风起云涌的报刊和书局，以稿酬解决其基本的生活问题，甚至赚取了更多的名与利。在当时“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社会现实中，他们摆脱了依附达官权贵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主地使用知识。在其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以朝廷的意旨为指导思想，而是以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为“上帝”。其小说中的知识人形象十分复杂，而这恰恰体现出士的近代转型所具有的过渡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以罗普、张肇桐、陈景韩、陈独秀、徐卓呆、陈天华、陈墨峰等知名人物为代表的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是在晚清留学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新型知识人，是晚清新学生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们融汇中外新知，站立在士的近代转型队伍之前列，代表了士的近代转型的一个前进方向。他们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就投入小说创作，以昂扬的激情和斗志来创作小说，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土的近代转型进程中的一束激昂而纯粹的光芒。

随着新小说的“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晚清小说家集体地摆脱了士之名份，而昂视阔步地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

总之，传统小说家在产生之初就被确立为士，当然是不入流的底层的士；他们的作品关注的是“修身理家”的小问题，被视为“小道”、“末学”。因此，他们在士中的地位很低，备受歧视和压抑。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的地位猛然飙升，他们关注的重心，则由“修身理家”的小问题变为“救国救种”的大事。但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从此终结了士的身分，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小说家作为士的身分以及身分变化，从某一侧面显示了小说家的整体命运和特性，其关注重心的变化，对其小说创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小说史意义亦由此可见。

● 作者简介：汤克勤，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东 梅州 514015。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09YJC751034）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我佛山人：《新笑林广记·咬文嚼字》，载《新小说》1905年第22号。